

也论新疆“三七政变”^{*}

姜 刚

“三七政变”由樊耀南及拥护他的新进派势力所发起，杨增新的牵制政策导致保守派作为制衡力量卷入其中，两股政治力量对决的结果是金树仁的最终胜出。新疆的政权更迭，为国民政府统合新疆提供了契机，而这场政变实质上是受隐伏于新疆社会深层的现代化革新的欲望所驱动。

关键词 民国 新疆 “三七政变”

作者姜刚，1983年生，兰州大学民族学研究院2008级博士研究生。地址：兰州市嘉峪关西路兰州大学一分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邮编730020。

1928年发生的“三七政变”，是新疆现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长久以来，为数众多的学者都曾就此展开讨论。大部分研究工作都侧重于考证尘封历史下的真相，探究政变真正的幕后主谋，然而笔者以为将“三七政变”狭义地理解为杨增新遇刺事件，不利于研究工作的深入，而应将杨增新遇刺到金树仁上台的整段历史视作“三七政变”的完整过程。下面，笔者将广义的“三七政变”置入新疆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发展脉络当中，力求用新的视角解析该事件的缘起、结果及影响。

一、“三七政变”发生的历史背景

杨增新在新疆维持政局稳定、巩固独裁统治的主要权术之一，是在政治、军事、社会等领域广泛地实行“羁縻”与“牵制”的政策。正如杨增新在晚年所总结的，“能筹措新疆于一时之安，都是从这四个字得来”。^①杨增新在新疆地方政权的人事架构中贯彻牵制主义理念的结果，是在其执政后期，新疆地方政权当中日渐形成“保守派”和“新进派”共存与对峙的格局。根据时任哈密王府总管的尧乐博斯的观察，“当时的省府人事表面看起来，似甚简单，其实则相当复杂，其中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金树仁为首的甘肃派，亦称‘保守派’，另一派是以樊耀南为首的两湖派，又称新进派”。^②

所谓的保守派，是指杨增新政权当中的部分官僚，他们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谙熟封建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清末民国近代化视野下的新疆社会变迁与民族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C850003）阶段性成果。

^①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

^② 尧乐波斯《杨增新、同胞、革命军》，《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兰溪出版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2682页。

社会官场的道德和行为规范，能够像杨增新一样熟练自如地运用“州县之道”处理一切行政事务。保守派“大都是杨氏在甘肃培植起来的文武学生，其中著名人物，如金树仁、周务学、鲁效祖、张培元、刘希曾、熊发有、阎毓善等人”。^①他们作为杨增新的门生，在其多年来的培养和熏陶下，在政治理念上必然与杨增新保持一致。

鸦片战争以后，国人逐渐认识到现代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民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强烈冲击下发生着深刻的改变。杨增新固守清代以来形成的新疆治理模式，逝去时代的统治经验被他视为一种宝贵的传统，以至于在陈中看来“其政治设施无一非满清遗制”。^②杨增新在新疆勉强维持着一个与其所掌握的旧有认知体系相匹配的社会形态。面对不断渗入的新兴观念，如“共和”、“革命”等，他只能用自身的知识体系对这些新事物进行释读，并以此作为对于时代发展不可抗拒性进行自我消解的一种有效方式。为迎合时代潮流，杨增新在新疆尝试推行一些新政，结果却并不理想，正如吴绍璘所评价的，“杨氏晚年，虽渐趋维新……然不揣其本而齐其末，致所耗多而收效少焉”。^③杨增新统治下新疆闭关自守和愚昧落后的状况，对于新疆内外濡染了新思想、新文化的国民来说难以容忍。“惟以潮流日非，思想渐变，青年派与思想分子恒多不满当局之行动，诽议甚多”。^④在新疆地方政权中树立一面能够代表现代化潮流的新进旗帜于是显得十分必要。

由于自身条件的局限，杨增新代言新疆现代化革新必然力不从心，因此只能另外寻觅一个新进旗手的角色。在这样的情况下，樊耀南进入了杨增新的视野。樊耀南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毕业。“樊氏有干才，颇为人民所信仰，故文有樊耀南，武有杨飞霞之语”。^⑤“樊氏勤俭节约，毫无嗜好，略同杨氏，绝非其他政界要人所能比。比较有新知识，略能与杨将军立异同的，可以说止有樊君一人。”^⑥因此，民国七年（1918），樊耀南二次来新之后，便受到杨增新的高度重视。杨增新对于“少有异同的人，全不敢用”，但樊耀南明显是个例外，他历任省府多个重要职位，一度同时兼着军务厅长、交涉署长、迪化道尹三个要缺，逐渐成为新疆“新进”势力的代表人物。“新疆较新的人全很恭维樊君。关内的革命潮流又是这样汹涌……同革命表同情的人全想推倒杨将军，推戴樊厅长”。^⑦

新疆“保守派”与“新进派”之间的对峙，可以视为分别以杨增新、樊耀南为首的两股势力之间的对峙，也可以说是新疆“传统”与“现代”两种政治理念之间的对立。杨增新对于樊耀南的包容、羁縻甚至强行挽留，在新疆地方政权中极力保留樊耀南这样一面代表时代潮流的新进旗帜，不仅是为了羁縻新疆内外的新进势力，同时也是为了在新疆“新”、“旧”两股势力之间造成一种牵制和制衡。新进派与守旧派之间的对峙和牵制能够使杨增新统治新疆的政策，在“因循”与“变革”之间保持张力和弹性，这对于应付未知的时局变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而这正是受黄老思想影响颇深的杨增新的复杂之处与过人之处。

① 尧乐博斯《杨增新、同胞、革命军》，《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82页。

② 陈中《新疆政变之因果》，《大公报》1933年6月11日。

③ 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书局1933年版，第102—103页。

④ 吴绍璘《新疆概观》，第107页。

⑤ 吴绍璘《新疆概观》，第109页。

⑥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三册，附录一。

⑦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保守派”与“新进派”的对峙，主要表现为杨增新与樊耀南在政治理念上的对立，并由此导致分别拥护杨增新与拥护樊耀南的政治派别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又导致“内地人民之旅新者，各分帮口，争执意见”^①，尤其是陕甘人势力与两湖人势力的对立久有历史传统的新疆出现了以金树仁为代表的甘肃人势力与樊耀南为代表的两湖人势力之间的对立，这一点，尧乐博斯和当时其他观察家们的评论均可以作为佐证。

杨增新治理新疆期间，他的追随者们在新疆地方政权的各个层次上占有优势，居于主体地位。“他们（保守派）自认与杨氏有师生关系。且又追随杨氏多年，将来继承主政新疆者，自非他们其中之一莫属”。^②但是本着平衡的需要，杨增新不仅未完全放任他们坐大，反而认为他们都不足以担当大任。“在金树仁一派人物的心目中，一致认为杨增新不重视自己的门生弟子，但是有意培植樊耀南之类的人物”。^③不过，杨增新对于樊耀南“防之甚严”，“樊耀南从杨增新多年，并未获得他自己觉得理想的政府职位”，令樊耀南之志不得伸展，“数数辞职，公又弗令去”。^④支持樊耀南的两湖人势力如张纯熙等人也受到压制，投闲置散，游走徘徊在新疆权力核心的外围，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杨增新娴熟运用“帝王心术”，据时势决定对保守派和新进派进行褒扬或贬抑。实际上是将保守派和新进派全都置于权力斗争的囚笼之中禁锢起来，使之相互瞻顾，相互牵制，不至于跳出杨增新的掌控，威胁到他的统治。

民国十七年（1928）六月，新疆通电易帜。其时，新疆上下人心浮动，人们普遍期待新疆归附南京，三民主义在新疆推行，能够使新疆呈现出新的气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杨增新理当提升新进派的地位，向外界宣示革新的姿态。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杨增新于七月二十日私自改组政府，新政府“有委员会而无委员，并演说三民主义在新疆从很长的时候已经实行”。^⑤新政府当中，作为保守派代表的金树仁地位得到提升，跃居第二。金树仁在新疆政坛中，是能够忠实遵循和继承杨增新政治路线和方针的人物的代表。因而杨增新逆流而动扬金抑樊的举动，其目的可能是通过这种方式向外界传递一种信息，暗示新疆不会因为易帜归附南京而骤然放弃形成于民国初年的“认庙不认神”的政治传统，而将会循着既往的政治路线和方向继续前进。

新疆易帜，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变动，新疆各属难免对于新疆未来的政治风向揣测不定。杨增新崇金抑樊，不过是故伎重演，通过一次政治上战术性的调整，警示新疆官绅商民认清形势，切勿首鼠两端。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增新此举收到的效果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杨增新崇金抑樊，使时人广泛坚信他将会对樊耀南采取更加激进的行动，即在与南京方面达成妥协宣布易帜的当口，杀樊耀南以警告可能借机向南京靠拢的新进派势力。在旁人看来，“杨将军素常是以翻脸不认人著名的，他今日待你很好，明天把你枪毙，是很做过几次的事”。^⑥

① 杨增新《呈明新疆招用回队理由文》，《补过斋文牍》甲集上。

② 尧乐博斯《杨增新、同胞、革命军》，《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82页。

③ 尧乐博斯《杨增新、同胞、革命军》，《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82页。

④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⑤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⑥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以霹雳手段冷酷无情地清除政敌，是符合杨增新过去一贯的行事方式的。于是，迪化的政治空气异常紧张，有流言称改组的省政府名单当中没有樊耀南的名字，致使樊为此栗栗自危。

如前所述，杨增新统治新疆奉行羁縻与牵制政策，通过羁縻新疆不同政治集团与派系，使他们之间形成相互的制约和掣肘，各有所瞻顾，不敢轻发，从而维持着新疆地方政权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局面。樊耀南是杨增新羁縻新进势力，牵制守旧势力的重要棋子，撤去这枚棋子，将导致大局全面改观，以致面目全非。因此杨增新抑樊背后，应该没有铲除樊耀南的打算，否则以他精明谨慎，虑事周全的性格，也不当对变起肘腋毫无防备。相对的，樊耀南“为人素向太小心”，因流言和猜忌对杨增新发起反戈一击，“不免过于鲁莽”。^①

樊耀南发动政变，最为根本的原因应当追溯到樊、杨之间政治理念的根本分歧。这一分歧，导致二者对于民国十七年新疆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杨增新似乎并不认为其统治新疆的政策已难以为继，维持一个新陈代谢缓慢闭关自守形态的“桃源胜境”，依然是他的崇高理想。而在樊耀南看来，杨增新治下的新疆社会已逐渐走向窳败，隐患潜滋，适时作出改变，全面释放新疆内在的现代化变革欲望，使新疆社会重新焕发活力，已经迫不容缓了。而樊耀南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主持新疆革新工作，“颇有俨然以将来主席自居的地方”。^②樊耀南及新进派厌倦了继续沦为杨增新羁縻和牵制政策下政治玩偶的命运，是其欲推翻杨增新统治的思想动因。而促成他们仓促起事的直接原因，则是因为捕捉到了一次发起倒杨政变的绝佳机遇。

民国十七年（1928），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的前景日益明朗。已有迹象表明，西北冯玉祥开始着手进图新疆之规划。民国十七年三月一日上海《中央日报》载：北京二月二十八日电，谓“冯玉祥援助马福祥由甘肃进攻新疆甚急”。而实际上这一计划，早在民国十二年（1923）五月十一日冯玉祥第二次出任西北边防督办时，就已经在酝酿当中了。^③为阻止冯玉祥插足新疆，杨增新派遣刘文龙为代表，赴南京斡旋。民国十七年四月八日，京沪各报报道透漏，“杨增新代表刘文龙，驻宁多日，现已返新疆，青天白日旗不久可飞扬于新疆”。^④显示杨增新欲借助国民政府南京方面的力量阻冯入新，而愿为此所提供的筹码即是通电易帜，脱离北洋政府，归附南京。六月，北伐军阎锡山部进驻北京，标志着统治中国达十七年之久的北洋政府垮台，国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成为中华民国新的中央政权。杨增新于十六日的铣电中宣布新疆“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新疆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帜，以后新疆一切善后事宜，均禀承国民政府办理，以归统一。除将如何改组新疆省政府情形另电陈明外，所有全疆治安，仍当加以维持，以纾政府西顾之忧。”^⑤

新疆易帜后，所谓的“善后事宜”和“省政府的改组”成为国民政府解决新疆问题成败的关键。因此，蒋介石在杨增新通电宣布易帜的当晚，紧急召见马福祥垂询新疆问题。六月二十四日，南京方面宣布“国民政府拟派任命马福祥为新疆宣抚使”。^⑥马福祥宣抚新

① 徐旭生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② 徐旭生 《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③ 参见罗绍文 《杨增新、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和新疆“三七”政变》，《西北史地》1995年第4期。

④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21页。

⑤ 《中央日报》1928年6月17日。

⑥ 张大军 《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21页。

疆，与后来的黄慕松、罗文干宣抚新疆的行动，在实质上并无二致，都是借口处理“善后事宜”，肩负着统合新疆完成全国统一的使命而来。杨增新在国民政府将其“宣抚”大计付诸实施之前，已于六月二十日，在既未呈明国民政府亦未得到国民政府批复的情况下，私自改组政府，公开宣布自任省主席兼总司令职。杨增新的这一蛮横行为，剥夺了国民政府作为中央政权参与和干预新疆事务的权力，使南京方面陷入尴尬的境地。至此，杨增新想用换汤不换药的方法掩人耳目，将新疆军阀政治延续下去的意图已经暴露无遗，杨增新表明态度之后，南京方面对杨妥协之前，其中的间隙，恰为樊耀南政变成功后将要开展的善后工作提供了一个可资转圜的余地，对于樊等人而言，是一次难得的政治机遇。因此，樊耀南等人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突然发难，可谓是合乎情理的抉择。

二、金树仁在“三七政变”中上台

樊耀南猝然发动“三七政变”，其主要的支持者为：杨庆南，湖南人，曾署轮台、沙雅等县缺；张纯熙，湖北人，为樊耀南门生，任俄文法政学校监学；吕葆如，江苏常州人，任迪化无线电报局长。发动政变所依靠的武力，主要为樊耀南本人的“三十个卫士”。“一切想推倒杨将军的人全是樊君的朋友”，这些人“虽言行未敢信仰，要皆思想新颖有为之士”^①说明政变是由新进派势力所发起的。这一状况恰恰决定了“三七政变”一开始便注定不能跳出杨增新精心设计的政治樊笼。

在制衡机制的作用下，居于新进派对立面的保守派与陕甘人势力必然卷入这场争斗。其原因主要有三：第一，樊耀南代替杨增新执政，新疆的政治方向可能由此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将导致“守旧派”在新疆地方政权中的实力和影响力受到削弱乃至被清算。第二，杨增新死亡，那些他原来主要的陕甘追随者们失去依靠和庇护，以樊耀南为代表的两湖人掌握政权可能将排斥陕甘人势力，使他们丧失掉杨增新先前恩赐的既得权益。第三，守旧派大多是杨增新的门生故吏，从情感和道德层面上讲，罔顾知遇之恩，坐视杨增新遇刺而袖手旁观，毫无作为，终究是一种怯懦而可鄙的行为。

金树仁成为新疆反樊势力的领军人物，有其自身特殊的原因。金树仁，字德庵，汉族，甘肃河州永靖人。据称，金树仁“幼奇慧，颖悟异常，诗文经书过目成诵”。这虽然有溢美之嫌，但是他确在光绪十八年（1892），以十二岁冲龄考中秀才，被时人赞为神童。光绪二十二年（1896），杨增新出任河州知州，“念养与教相为表里，乃割俸钱重修凤林书院，并增建龙泉、爱莲两书院，延名师教之，文化大兴，是科书院肄业生，登贤书者九人。又为开孝廉堂，招邑之俊秀子弟，入署躬自课读，一时人才蔚起，为一省之冠”。^②金树仁在此时，以“俊秀子弟”，受到杨增新的赏识，招入州署，“亲自教读”，从而结下了师生之缘。光绪二十七年（1901），杨增新调任甘肃学政兼高等学堂监督，金树仁便负笈省城，从杨游。在杨增新的关照下，金树仁先后入甘肃文高等学堂和法政学堂深造，尽师硕儒，尽友群雅，由是见闻骤广，记览骤博。金树仁早年的经历使得他与杨增新之间建立了非比寻常的师生情

^① 吴绍璘《新疆概观》，仁声书局1933年版，第109页。

^② 王树楠《阆威上将军勋一位新疆省政府主席兼边防督办蒙自杨公神道碑》。此碑位于北京昌平区，方树梅辑撰《续滇南碑传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录有碑文。

谊。

杨增新主政新疆以后，欲培植亲信。金树仁于民国初年应杨增新召唤，毅然西出阳关，投效于恩师麾下。金树仁初到新疆，从基层起步，先在杨增新幕中供职，任省府书记官兼科员。民国五年（1916）六月，杨增新呈请北京政府，在巡按使署内设立政治研究所，培训“吏才”，“以养成吏才而收得人”之效。^①金树仁在政治研究所的招考中，名列第一。又于其后参加杨增新主持的全省县长考试，以甲等成绩分发任阿克苏县长。在迪化、库车、疏附等地“出任县长四次”，^②在基层辗转历练凡十余年。这固然是得益于杨增新的赏识、培养和提拔，但是也必然与其才干与政绩是密不可分的。

金树仁长于“公文书牍”，为人低调，忠实而勤勉。作为一名技术型官吏，他擅长有效率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政策和指令，在理念和方略层面上不能够与杨增新“别立异同”，是他身上一个显著而颇具争议的特点。在杨增新时代的宦海生涯中，金树仁亦步亦趋地紧密追随杨增新的政治路线，时时以杨增新门生自居，处处模仿自己的老师，“主省务，宜师杨之策”^③他因此被打上“保守派”的标签，没有丝毫不当之处。金树仁在个性、才情、政治倾向方面的特点，甚至是他那颇受质疑的操守，糅合在一起，恰到好处，使他能够成为杨增新的得力助手，在特定情况代表杨增新但又不足以取代杨增新，即所谓“才气学能都嫌不足以担此大任”^④不会对后者的地位构成威胁。金树仁因此受到杨增新格外的垂青，仕途平坦，平步青云，也就不足为奇了。民国十五年（1926），金树仁被擢升为新疆省公署政务厅长，跻身省府高层，顺理成章地成为保守派与陕甘人势力当中的代表人物。

作为保守派阵营当中的领军人物，金树仁既肩负着作为个体捍卫自身政治理念，又担负着卵翼其所代表的群体利益的双重使命。“三七政变”前夕，杨增新拔擢金树仁出任新疆新政府的民政厅长，在省府委员名单中位次第二，不仅进一步提升了金树仁固有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增强了他的代表性和责任感。金树仁追随杨增新几近三十载，他在新疆政坛崛起的轨迹，使其自信有资格成为杨增新的“当然接班人”，^⑤是杨增新政治遗产第一顺位的继承人。由于以上公私两方面的原因，金树仁在公署“闻变”的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挑头组织“平叛”。

新改组的省政府机构中，虽然司理新疆军政事务的军务科在金树仁的民政厅管辖之下，但是军令权却是由杨增新通过设置在督署三堂的一个办事机构牢牢掌控。金树仁最初没有握有真正意义上的武力，他所能够动员的人手仅仅只有自己的卫士和拥护他的几个武人，如时任军务科长同为甘籍人和杨增新门生的张培元，冯梁以及好友黎海如等。法校混战当中，杨增新及其卫队长高连斗、副官张子文、王祉、冒维新等人被杀，造成了樊耀南与护卫军之间的对立。得到护卫军支持的金树仁方能以优势兵力将突入督署三堂的樊耀南等人重重包围。新疆陆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杜发荣之死，更加加剧了两湖人与甘肃人之间的派系仇恨，

① 杨增新《呈报设立政治研究所文》，《补过斋文牍》甲集下。

② 参见潘祖焕《樊耀南刺杀杨增新的前前后后》，《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7页。

③ 陈澄之《伊犁烟云录》，中华建国出版社1948年版，第28页。

④ 尧乐博斯《杨增新、同胞、革命军》，《传记文学》第十一卷第六期。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82页。

⑤ 参见孟东《发生在新疆的七七政变》，《纵横》2002年第8期。

促使杜发荣之子，陆军第二旅第二营营长杜国治及陆军营长甘肃兰州人王大成、涪川人张毓秀响应金树仁的讨樊行动，这使得金树仁在实力对比上取得了压倒性优势。相对应的，樊耀南一方，实力不济，准备不足，“事后张皇失措”，^①于是樊耀南仓促发动的政变被迅速平息。

杨增新遇刺后，新疆群龙无首，迪化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军政大位虚悬，搁置日久，恐引起各族群众误会，疑猜横生，影响治安。于是推举杨增新的继任者人选成为当务之急。粗略而言，军界当中深孚众望的陆军老将蒋松林、善于治军的杨飞霞，政界当中如阎毓善、徐谦、刘文龙、李溶、金树仁、朱瑞墀等人都有资格成为继任的人选。相对而言，金树仁的优势并不明显。论资历威望，金树仁不如陆军第一师师长蒋松林、前伊犁镇守使杨飞霞或前教育厅长刘文龙。论才情，金树仁非庸碌之辈，由于自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其旧学功底十分扎实，尤其擅长“公文书牒”。但是其学问识见，与“留学东瀛，专攻法律”的樊耀南这样的人物相比，在当时的时代潮流和背景下，在“新”与“旧”，“西”与“中”的判分中，终究显得稍逊一筹。同样是在当时新疆的旧派人物当中，金树仁的才华在阎毓善和徐谦等人之下，亦是为时人所公认的。^②论道德操守，金树仁无法和樊耀南这样的新派人物比肩。樊耀南“待人接物，和蔼谦恭，无论谁去见他，一概接见，临走送到大门，才鞠躬而退，新疆人都称他为樊圣人”。^③同时樊耀南“人很清廉”，“自处也异常的俭约”，遇大事尚赖杨增新于官俸外另予周济。^④与旧派人物相比，金树仁也没有类似于徐谦和桂芬的节操和清誉，但是也没有阎毓善、马绍武一类人那样的“聚敛”盛名，更不似马福兴“广渔民间妇女，霸占公私田地，聚敛民间财富，滥用各种肉刑，别人手足”^⑤那样暴虐。金树仁的道德操守并不完美，甚至可以说颇有瑕疵。这是因为他“好抽大烟”，这一点从时人的记载来看，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金树仁的这一特殊嗜好，使得他呈现在公众眼前的是一副瘾君子的面孔，正如斯文·赫定对其外表的描述“瘦高身材、长脸、长鼻、尖脑壳”。^⑥这对于金树仁的政治形象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金树仁最终胜出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省府军政两届，素著资历与威望者，多已老耄，金树仁是他们当中幼且壮者。其次，新疆军政两届，陕甘人最居多数，以金树仁出面主持新疆军政，更为居多数的陕甘人所乐于接受，有利于稳定局面。第三，金树仁在平乱过程中掌握了迪化大部分的军队，又通过张培元等人四出活动，秘密串联，上下游说，扩大了他在军界得到的拥护和支持。第四，金树仁率先发起讨樊行动，成功挫败“三七政变”，平樊有功，已在新疆统治权的角逐中拔得头筹。第五，“三七政变”当日，金树仁在省府张贴的讨樊告示上落款署名为“新疆省政府临时主席”。^⑦《申报》刊登的金树仁的一篇文章则更进一步显示，其在事变当天已自称“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七月七

① 参见笑倩《民元以来新疆行政机构之沿革及政治变迁之概略》，《瀚海潮》第1卷第8期。

②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701页。

③ 广禄《新疆州年动乱亲历中谈》。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637页。

④ 参见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⑤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83页。

⑥ [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⑦ 参见柴恒森《七七政变亲见片段》，萧乾《昆仑采玉录》，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76—77页。

日……情形危急，经军政绅商各界大起公愤，痛哭流涕，公举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兼总司令……树仁迫于公义，万不得已，只得勉受其难。”^① 事发突然，政变未平，须臾之间集会公举主席兼总司令断无可能，所谓公推，显然是金树仁妄自僭称主席兼总司令的粉饰之辞。金树仁以为杨增新复仇为旗号，组织号令讨樊行动之初，即抢先一步窃据新疆军政首脑的宝座，造成既成事实，这为其在杨增新身后新疆统治权的争夺中赢得了先机。最后，“三七政变”被平定后，金树仁在主持组织军法会审，处理樊耀南案，安定人心，稳定秩序，为杨增新举哀发表等一系列事件中，既猎取了声望，也进一步在众人心目中强化了其为杨增新继任者的印象，为其继任增加了砝码。因此，尽管“政界要人不满意他的人很多”^②但在省署召开的各厅道齐聚商议“善后事宜”的会议上，金树仁仍然得到了在场军政官吏的公举，接掌了新疆政权。而金树仁也于七月十六日正式“移入省政府办公”，“省府各委、厅、南北疆将领、各族王公，致电表示拥护”。^③

三、国民政府以“三七政变”为契机对新疆的统合

金树仁接替杨增新统治新疆至此已成定局，唯一缺少的是来自南京的一纸任命，为其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披上合法外衣。杨增新遇刺身死，使得南京方面于七月九日议定的对杨羁縻妥协方案^④自动作废，国民政府统合新疆的前景又重现一丝曙光。因此，南京政府仅仅指令金树仁以“暂行代理主席”的身份处理善后事宜，维持治安。樊耀南被金树仁捕获后，“先行割舌”，后于“夜中”即被杀。^⑤南京方面利用樊耀南大做文章已无可能，只得先令距离新疆最近的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收集相关情报，对“三七政变”后新疆政情作一评估，据此制定应对之策。刘郁芬于七月二十三日回覆南京称“新省军队约有八万，省驻两千，余驻哈密、喀什，金树仁系一文吏，肩此重任，才力逊于杨增新甚远，此后内外棘手，非金所能维持。该省种族庞杂，苏俄稍有煽惑，不难立变，撤去甘肃屏藩，或为东省第二。”他建议，“须派声威素著之大员前往，才有可能，否则，派老成积练，负有清望之人物前往收拾，转觉相宜”。^⑥

刘郁芬对新疆局势的评估，给南京方面的新疆决策造成的直接影响是，对于金树仁的正式委任被搁置一边，国民政府开始酝酿新的统合新疆方略。国民政府统合新疆计划的内容，在外界引起了广泛的猜测。同年八月十九日，上海《中央日报》发表马福祥将赴新疆的消息，其文称“马于十六日赴保定，拟调第二集团军抽一部赴新，由马率领前往”^⑦于是国民省府将派兵平定新疆一说一时甚嚣尘上。而在此前，新疆省党务指导委员定希程已宣布将于八月初回新疆，欲作中央政府执行新疆新政策之先导。定希程拟请在南京和迪化分设

① 金树仁《新疆杨增新被戕情形》，《申报》1928年7月18日。

② 徐旭生《徐旭生西游日记》，第三册，附录一。

③ 陈津《忆金树仁在新疆》，《临夏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临夏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9年印。

④ 国民政府拟任杨增新为“新疆省主席兼理新疆边防事宜”，并在新疆设立政治分会，将蒙古、西藏划入在内，以杨增新为主席。

⑤ 参见《新疆各县民众代表方仁、饶乐博斯等致国民党党部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⑥ 转引自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704页。

⑦ 《中央日报》1928年8月19日。

“回族代表驻京办事处”、“新疆省党务通信处”^①以交通消息，搜集新疆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情报，报送中央。

客观而论，民国十七年（1928）间，国民政府并无以武力迫夺新疆的实力，且内外交困，根本无瑕抽身西顾。在缺乏实力支撑的情况下，派遣“中央大员”孤身犯险前往新疆置换金树仁，无异于与虎谋皮。而根据定希程的报告，“新地北接苏俄，该地俄人设有机关专事勾引青年，宣传共产。南连阿富汗，英又在阿设有领事，一般无知新民有向彼登记入籍者”^②与刘郁芬的报告相互参证，也令国民政府对于俄、英侵逼新疆的企图心存忌惮。南京国民政府意识到无力经营新疆，若任新疆军政大位虚悬过久可能会引发变乱，重蹈阿古柏之乱之覆辙，于是转变策略将工作的重心转移到分割金树仁权力的方向上来。

十月二十三日，国民政府第三次国务会议抛出新疆分省方案。这一方案的内容为：新疆土地广大，蒙番杂处，割为两省较易治理。按其地势应以天山为天然省界，若于新疆政局定后，将天山以北划为北新省治于迪化；天山以南为南新省设省治于和阗或阿克苏，实于地势及政治上均极便利，并拟将唐努乌梁海、科布多、三音诺颜札萨克图汗划为一省，设省治于乌里雅苏台。^③新疆分省分案，是欲效仿清代伊、新、科阿分治，再造抚军并立，“两大不容，权力掣肘”^④的格局。试图以此在新疆造成分权制约，分割金树仁的军政权力，限制并削弱其实力。分省议案指定由冯玉祥、张继、谭延闿、李济深、戴传贤审查未果，从此被束之高阁。

分省之议不行，赋予金树仁临时政府政治合法性以绥抚边局之事不能无限拖延，于是对金树仁的任命只得无奈放行。此前，国民政府已于十月十二日电金树仁依据省政府组织法组织政府，并令其确定各属人选，报中央核定后任命。金树仁对新疆省政府的改组方案，于十月二十三日漾电呈报中央。经国民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批准，民国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中央政治会议第161次会议议决，正式任命金树仁、王之佐、徐谦、刘文龙、张正地、陈继善、阎毓善、屠文沛、李溶为新疆省政府委员，指定金为主席，王之佐兼民政厅长，徐谦兼财政厅长，刘文龙兼教育厅长。^⑤

金树仁在行政权力方面的要求，南京方面均予照准。新疆军队总司令这一军事职位的任命，于是成为国民政府手中唯一的筹码。军事职务的保留，是为在将来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整顿新疆军务，分离军政权力，为国民政府未来统合新疆的行动预埋伏笔。国民政府收紧口袋的举措使得南京与迪化的博弈暂时陷入僵局。在南京方面一筹莫展的过程中，金树仁赢得了时间，逐渐完成了对新疆军政权力的整合。鉴于金树仁控制新疆已既成事实，在金树仁派驻南京代表广禄的斡旋下，国民政府与金树仁最终敲定交易。金树仁接受向中央妥协的九项条件“1. 忠诚不二的服从中央政府。2. 解除封锁，使内地和新疆人民自由来往，不加限制。3. 澄清吏治，整顿军队，兴办教育、建设、交通以及其他。4. 对各民族一律平等，不应歧视，并不次提拔各民族中优秀分子参与政治。5. 对苏联外交，应师杨增新办法，在不

① 参见《中央日报》1928年7月25日。

② 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705页。

③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708页。

④ 王力《试论清末新、伊分治的满汉关系因素及其影响》，《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⑤ 参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2708页。

损失国家权益范围内以与之友好相处。6. 请中央政府急修伊兰铁路。7. 开辟新绥汽车路线, 缩短内地与新疆之距离。8. 新疆种出产样品, 运京展览, 使内地人了解新疆于万一。9. 新疆各市、县设立短波电台, 完成通讯网以利通讯。”^① 国民政府则将金树仁梦寐以求的边防督办之职作为顺水人情授予他。民国二十年(1931)十二月二十五日, 广禄代表南京将边防督办印信送达迪化。金树仁以隆重的仪式, 向民众宣告新疆军阀政治的历史, 真正意义上过渡到他的时代。

四、结 论

杨增新利用樊耀南羁縻新疆的新进势力, 与守旧势力形成相互牵制。而他则居中驾驭, 使其统治新疆的政策能够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因循”与“变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弹性。樊耀南及其支持者发动政变, 意在通过颠覆杨增新的统治, 解放他们自己及其所代表的新疆内在的变革欲望。樊耀南不成功的政变, 与国民政府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下的现代化解决方案——三民主义对新疆的统合, 是两股分别来自新疆内外的现代化革新推力。樊耀南与国民政府, 在现代化潮流这一共同的历史主题下, 在方向性上不谋而合, 都“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② 倒杨势力与讨樊势力之间的对决, 不过是杨增新羁縻与牵制政策下, 保守派与新进派对立状态的升级形态。新进派的败亡与保守派的胜出, 从根本上说, 是由二者之间实力差异所决定的, 而杨增新对于他们分别的扬抑正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杨增新遇刺之后, 新疆政治秩序重构, 金树仁能够于新疆政坛中脱颖而出, 接管新疆地方大权, 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迪化政权的更替, 国民政府放弃了原定的对杨妥协方案, 与其继任者金树仁展开了新一轮的博弈。国民政府在根本无力完成统合新疆全盘规划的情况下, 退而求其次, 抓住金树仁苦心孤诣地谋求权力合法性的弱点, 迫使他向中央权威屈服。金树仁所作的让步和承诺, 实际上已经在促进新疆与全国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接轨方面, 迈出了宝贵一步。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 是“三七政变”, 在杨增新统治的围城上打开了一道缺口, 为当时空气沉闷的新疆社会, 注入了一丝活力。

(本文责任编辑 李大龙)

^① 广禄 《广禄回忆录》, 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第132—133页。

^②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Key words: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judicial reform borderland special policy

On March 7 Coup (三七政变) in Xinjiang Jiang Gang (39)

The March 7 Coup was staged by Fan Yaonan and his supporters, the new faction, and the containment policy of Yang Zengxin resulted in the involvement of conservatives as a balance power. As a result, Jin Shuren won out. The alternation of political power in Xinjiang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o unify Xinjiang, while the coup itself was virtually driven by the potential desire of the society for initiating modern innovation in Xinjiang.

Key words: the Republic of China Xinjiang the March 7 Coup

Li Chongxia (李重夏) and the Hypothesis of “Tumen (土门) and Tumen (图们) are Two Rivers” Chen Hui (49)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Joseon king claimed to Qing emperor that the boundary river Tumen on Mukedeng tablet (穆克登碑) was not the Tumen river but Hailan river (海兰河) which later changed to Huanghuasong Gouzi (黄花松沟子) and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should be Tumen. Therefore, the two sides had a couple of boundary negotiations. In that course, Korean official Li Chongxia insisted the hypothesis of “Tumen and Tumen are two rivers”, although he knew his fault. After the negotiations, Li Chongxia stated his honest opinion on the hypothesis by Biedan (别单) he presented to the authorities for several times. He demonstrated that the Tumen was really Tumen river which was 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China and Korea from the early of Joseon Dynasty, the mastermind of the hypothesis was Yu Yunzhong, the Buerhatong river which was considered as boundary river by Korean was wide of the mark.

Key words: Tumen Tumen river Li Chongxia

On the Internal Ethnic Market in Tibetan Area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Yang Huiling (56)

In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rming and animal husbandry, handicraft industry and the external trade in Tibetan area, the internal comparatively developed ethnic market appeared. In some areas, the business bazaars were prosperous, the types of commodity were abundan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marketplaces and the business personnel were both extremely distinctive.

Key words: the Song and Yuan Dynasties Tibetan area the ethnic market

A Study on the Copper Mining Industry in Yunnan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Ling Yongzhong (64)

During the period of Anti-Japanese War, the copper for homeland defense were badly needed, yet the most of land had been occupied by Japan and Yunnan province became the only provider of copper to meet the military supplies. The resource management committee, which was subordinate to the economy ministr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and Yunn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jointly established the Mining Bureau of the North Yunnan (滇北矿务局) to “thoroughly manage” the copper mining industry of Yunnan, and made it completely the resources for the national military strategy.